

人与岁月

赵铁林：
「老三届」
岁月

赵铁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赵铁林 我的

「老三届」岁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铁林：我的“老三届”岁月/赵铁林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人与岁月丛书)

ISBN 978-7-02 008083-0

I. ①赵… II. ①赵… III. ①赵铁林-回忆录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7875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9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24.5 插页 2

2010年9月北京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8083-0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岁月无情,人生有涯。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人类的个体,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命运遭际、希冀与无奈,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有了这套“人与岁月”丛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

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主要辑入传记、自述和回忆录,其中既有私人往事、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

第一章

1

冯宝珠把她所在的废品收购站点燃以后，我在城里就再也待不住了。“复课闹革命”的尾声就是全校的学生一律“上山下乡”。农村的学生早已走了，城里的学生除了少数和工宣队有点关系的，也都下放到了温县。旧时怀庆府的温县紧靠黄河，从温县来的同学们说那里有司马懿的藏兵洞，但我不能到那里去的。工宣队给我定的是“保守派”的坏头头，跟着学校的大队人马下放到那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虽然在1967年，我已经遭受了对立派的“斧钺之伤”，但仍需“提高警惕”，两派的对立情绪如此根深蒂固，他们绝不会因为打了你而动恻隐之心，给你“东山再起”的机会。那年我才二十岁，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后福”可不能断送在我的同学手里。

从二中坐汽车到潞王坟，票价是两毛六分钱，我联系插队的杨久屯就在潞王坟所在的凤凰山脚下。口袋里的钱不多，能省则省，我背了个行李卷，提着一个放着脸盆和盥洗用品的网兜，顶着瑟瑟的北风往潞王坟走去。卫河的大部分水面都已结了一层薄冰，站在共产主义大桥上，可以看见它逶迤地伸向东北方。这条卫河，据说就是当年走漕船，经天津卫给北京运粮食的卫水。想必它当时水面宽阔，渔帆点点，可现如今在凛冽的寒风下，竟被一拱名为“共产主义”的砖石桥跨了过去。过了小朱庄，我再也走不动了，浑身冒汗。

天阴得厉害，细小的雪花随着北风乱舞，打到眼镜上变成了水雾，上了



我听见了汽笛声，汽笛不是来自左边，因为那里就是京广线，而是来自右边，来自化纤厂高大的厂房。

汽车才觉得好一些。在耿黄站我下了车，距离村子还有五里地，我必须于晚饭前赶到大队部。冬季的农村晚饭开得很早，而我的住宿和吃饭问题都还没有着落。过了上界村就是一片开阔地，一条小路摆在我面前。路两边没有人，枯黄的玉蜀黍秆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我很诧异为什么没有人把它们收回家去当柴火烧。我听见了汽笛声，汽笛不是来自左边，因为那里就是京广线，而是来自右边，来自化纤厂高大的厂房。汽笛响过之后，就是凝结成冰晶的小雪花敲打在玉蜀黍秆的枯枝败叶上发出的沙沙声。当这些响声都停止了的时候，我也就进了村。

樊梨花的家紧挨着大队部，下乡之前的几次联系使我和她熟识起来，那年她大概三十多岁。每次见面，她都非常习惯地用一种半生不熟的政治术语，不断地强调她是贫农出身，而且对时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非常支持。表白之后，便是询问我的出身，我惶恐不安。我的处境十分糟糕：1966年9月，母亲

在北京木樨地跳河，寻了短见。父亲正在接受造反派的审查。如果我如实地将情况透露给她，说不定这个大队就不会接受我，因为她就是这个村的妇女委员。一问到出身，我就赶紧低下头，说我是“下中农”。她听了后十分高兴，表示我们是一家人。因为是“一家人”，她甚至于给我沏了一碗糖水：“小赵，你高中毕业，有文化，支委会研究后决定让你下到二队，二队的阶级成分比较好，只有两户地主，人也比较老实。你们的队长尹占魁参加过抗美援朝，一条腿。我也是二队的，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说罢，就非常友善地朝我笑一笑，可是我心里一点也不自在。她患有“甲亢”，眼睛向前凸起，脸上虽挂着笑容，可双目灼灼。

天色已晚，我决定先不去樊梨花家，而直接到尹占魁那里，好歹也得把住的地方给安顿下来。“日他个逮啊！你怎么这么晚才来，饭后我要到大队部学习毛泽东思想，所有队干部都得去。你吃了没有？”我的肚子空空如也，就不准备撒谎了，告诉他没吃。“日他个逮，去给小赵摊两个小饽饼，甜汤还有没有……”这几句话分明是对他老伴说的。他把煤油灯的灯芯往上拧了拧，橙黄色的光便在屋子里弥漫开来。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消瘦的面庞布满了烟容，两只眼睛有些浑浊，眉宇中间，堆起一个鹌鹑蛋大小的疙瘩。他的这副面孔比镜框里穿军装的照片确实是老得很多了。

吃完了饭，他吩咐他的孩子到大队部给他请个假，告诉支书队里来了个知青，他要安排一下，随后再去学习。

杨久屯这个村子分成两块，分别是北地和南地，两地中间约莫有二里路，尹占魁的家虽然在南地，但是二队的牲口棚却是在北地。我是这个村子里来的最早的知青，队里还没有任何安排。从尹占魁家出来时他就告诉我，每个知青二百七十元的安家费，大队已经拨到了小队，但是脱坯盖房得等到明年春天了。冬天知青的住房他会想办法，但今天晚上我只能在牲口棚里睡了。离开南地，丈把宽的土路漆黑一片，他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拄着根棍子，走在我的前面。我背着行李卷，默默地跟在后面。起于下午的小雪花已经变成了鹅毛大雪，风也停了。旷野中，他那条装配得不太好的假腿“咯吱，咯吱”有节奏地响着，马灯所形成屁股大小的亮光照着我的脚，一前一后地走。

头伏槽(牲口棚)在北地的村口,三间土坯房,一间圈养着队里的几头牲畜,一间堆放草料,还有一间放的是队里暂时用不着的几件农具。尹占魁打开饲养室,将马灯放在窗台上,用一根火通条拼命地捅炉灶。和着水气的煤烟散开之后,蓝莹莹的火苗就从灶眼中蹿了出来。他拿了两个矮凳放在灶台上,说:“小赵,你先坐着,暖和一下,我去给牲口加料。”“哧”的一声他划着火柴,将炉台上方的煤油灯点亮,然后提着马灯将一个簸箕挟在胳肢窝下,走出了房门。所谓的煤油灯就是一个药瓶、一块铁皮和一个捻儿。如果煤油的质量好,铁皮卷成的小孔里的捻儿就不会结疤,否则就会毕毕剥剥地爆出灯花,火焰也会小下去,最后只剩得像黄豆一样大小,所谓一灯如豆是也。不过这些知识,是我下乡很长一段时候后才得到的。当时的感觉就是有电灯不点,非得点煤油灯,队里的经济状况恐怕未必佳。

堤外就是东地



尹占魁拿着和好的草料，给队里的四头骡子和两头牛加料，生怕料拌得不匀，不断地用手在料槽里划拉。圈里的气味不太好闻，但我觉得还不错，起码浑身上下没有那么冷了。尹占魁干完活也坐到了炉台上，假肢不能弯曲，只好伸到炉台外。他从口袋里掏出了水烟，默不作声地抽了起来，黧黑的手将水烟丝卷成鼻涕纽大小，一口一个，连续抽了五六口后，开始和我讲话了。我真怕他那句口头禅——“日他个逮”啊，不过还好，他只是平缓地说道：

“你们这些学生不在城里好好读书，到农村来干什么？”

“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他不以为然：“村里的地本来就不多，一人划不到一亩，一个劳动日，也不过三四毛钱，你们十几口学生一来，又干不了什么庄稼活，不是让社员养活你们吗？二队的劳动力最少，有点本事的都进城了，要不，我才不会欢迎你们来插队呢！”

我说：“插不插队，你也当不了家，我也做不了主，这是政策。”

尹占魁不再说什么了，表示他要去大队部开会，告诉我今天晚上就睡在料间，明天早上出工，到东地去刨砂礞。进了草料间，他把麦秸铺开，让我把行李放在上面，说这样可以暖和一些，同时把脸盆扣过来，把他的马灯给我留在上面，临出门时他问我抽不抽烟，我说不会，他这才放心，咯咯吱吱地拖着他那条不太灵活的假腿往南地走去。

我躺在被窝里，将马灯熄灭，准备迎接明天的到来。两扇纸糊的窗户有不少破洞，冷风从缝隙中吹进来，使我不住地发抖，我强迫自己进入了梦乡。

2

天终于亮了，这里虽然是农村，却没有鸡鸣狗吠的声音，夜间不断驶过的火车的隆隆声，使我觉得我和都市生活离得还不算太远。乱七八糟的噩梦纠缠了我一夜。下乡后的第一夜终于过去了。时间是1968年12月15日。

我刚穿好衣服，尹占魁和呕牛已经开始套车。呕牛是一位年轻的后生，二十一二岁，是队里的车把式。尹占魁告诉他，今天他的工作是到潞王坟火

车站运石料。冬季的农村,大田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活,让驴牛跑跑运输,还能给队里赚两个钱。尹占魁同时兼二队的饲养员,他腿脚不方便,除了当队长,饲养员也是个整劳力,每天可以拿到二十分。这样算起来,他每天就是两个整工。二队的社员对此也没有什么异议。他让我到他家里去吃碗粥,并说今天的“派饭”就安排在他家里。饭罢,再到李克己家的墙根等着副队长带我到东地去刨砂礓。副队长李克礼是李克己的哥,村里人都管他叫“半挂车”,意思是说他力大无比。

所谓东地,就是村里防护堤外的一大片耕地,一眼望不到边。卫河将村里的地和牧野公社东曲里的地分开,一直流入卫辉府的汲县。东地是一片沙化严重的土地。刨砂礓就是将严重沙化的地里尚未完全风化的石灰石刨出来,用筛子筛过后,再将细软的沙土装上平车,拉到潞王坟电厂,卖给工地。

所谓东地,就是村里防护堤外的一大片耕地,一眼望不到边。

我从来没有捏过镐把,也没下过这么大的力气。疯狂地刨了一阵以后,砂礓没刨出多少,我却累得气喘吁吁。“半挂



车”在旁边筛土，一句话也不说。这样出色的表现竟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我有些忿忿不平。隔了半顿饭的工夫，李克己和他的儿子满场也来了。满场和我一般大，也二十岁。他看我顾头不顾腩的干法，说这样不行，天还早着呢，干活得悠着点来，否则手上会起水泡。我摊开双手，手掌果然已磨出了几个水泡。李克己的外号叫“滑稽货”，到了地边，找到他们昨天刨的坑后，先不干活，叫我也停下来，抽他的两口水烟。我抽了一口，差点没有呛晕过去。他看着我的狼狈相，挺高兴。问我的眼镜是多少度的，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隔着玻璃看”，并说他不赞成学生下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修理地球是庄稼汉的事，你们这些学生到农村来只会添乱，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接着又说，“瞎巴人干瞎巴事，学生下乡是斯文扫地，村里现在没有一个高中生。要是在过去，高中毕业就是个秀才，那是光耀门第的事。”

满场父子俩在他们那个坑懒洋洋地干了起来，不很看见动作，但出的沙土却比我和“半挂车”多得多。冬日里的阳光还是能给人以温暖，我已经将我的破棉袄脱了下来，抡开了膀子干，想超过他们。这时我才看到“半挂车”脸上有那么一丝笑容。

晚饭后，大队像往常一样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所有的知青都得去。可村里眼下只有我一个知青，不用叫，我自己就去了。大队部的正房坐北朝南，靠东边隔出一小间，是队里的广播室。人还没到齐，书记王振国就对广播员小凤妞说：“再吆喝几嗓子。”小凤妞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丫头，初中毕业就在家里等着纤维厂农转非的工人指标。她姐姐大风妞已经到纤维厂当了工人，而且还和一个城里的小伙子结了婚，眼看这几天她就要当小姨了。村里有这么一帮女孩子，就专门等公社的指标，到城里的工厂或公社的卫生院去吃商品粮。

小凤妞打开扩音器：“烱晚都几点了，还不赶快到大队部来！尹世发、王振东、王振宇……赶快到大队部来！”吆喝完了，她就“咯咯咯”地笑起来：“怎么样，大学生？我的普通话还不错吧！”我有点发窘，对着她那张调皮的脸忙说：“不错，不错。”

又隔了一顿饭的工夫，外屋的人总算到齐了。樊梨花开始领着大家唱



巷子中间有一个挺气派的门楼，小凤妞说那是支委于振芬的家。

《东方红》。《东方红》之后就是“晚汇报”，每个小队长发言之前，都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队长们的文化程度不高，都拣最短的念。四个队中有三个队念的是“要斗私批修”，只有三队的队长王振东念了一句“《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王振国对着王振东喊了起来：

“你这个孬货，让你念的是毛主席语录，你念的是个啥？”

王振东嬉皮笑脸地对支书说：

“我说你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嘛，只会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将来地里长的都是资本主义的庄稼，看你们还吃什么！小赵是一高（即一中）毕业的，有文化，你们不信问问他，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王振国说：“算了，算了，快让小凤妞念两段报纸，别耽误了大家的瞌睡。”

王振国说：“算了，算了，快让小凤妞念两段报纸，别耽误了大家的瞌睡。”

小凤妞对着我说：

“小赵是北京人，念报的事应该让他来管。”樊梨花马上递过眼神来鼓励我，好像二队有这么个知青于她脸上也有光。我接过报纸，字正腔圆地念了起来。学习完后，王振国把支委留了下来继续商量村里的事，其他人都是可以回家了。

出了大队部，小凤妞非让我送她，说从她那里到北地，比我原来走的那段路要近许多。小凤妞的家在一条小巷子的紧北头。巷子中间有一个挺气派的门楼，小凤妞说那是支委于

振芬的家。这天晚上没有风,月光也挺好,到了她家门口,她告诉我再往北绕过庆杉的家,有一条小路,沿着小路一直走下去,就到北地了。我对她说以后念报的事,还是由她来干,我还没安顿好,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说不定还会回城。她说:“那怕什么,不行你就住大队部,让大队给你想办法。尹占魁是先干国民党,后干共产党的,人抠得很。”

我说:“我觉得他人还不错,只是话少了点。”

她又感叹道:“你要在我们三队就好了,三队比二队富,工分值也高,我还可以跟你一块学文化。”

过了庆杉家的后山墙就没有人家了。一条小路明晃晃的,路边的机井房和场院上的石碌碡,黑影憧憧看上去有些吓人,我总觉得那里会走出来个什么。远处,京广线上过火车,一串移动的灯光,又使我胆子大了起来,心里想,这可能又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章

1

人生大概总是会碰上大大小小的转折点,在我的印象中,我家的转折总是与一次次的搬家相连。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搬家也一样。可是我家的几次搬迁,总是笼罩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之中。打我记事时候起,就觉得家是越搬越小,爸爸、妈妈的脸色则越搬就越难看。

刚进北京时,我们家住在花园胡同11号,就在西单附近。无论从胡同的哪个口子拐出去,用不了十分钟,都可以到达西单。我那时才五岁,西单在我的记忆中可以化简为嗡嗡作响的冰激凌机和一毛五分钱一盞的好吃的冰激凌;路边的几处牙科诊所;一幅广告招贴画,画上有一个人没牙的外国人在张着嘴怪模怪样地大笑。

花园胡同11号共住了三户人家:阎太太家住中间;坐北朝南的那一溜房是谭副检察长的家,房产原来是国民党一个师长在撤出大陆前买下来的;我家的房子是坐南朝北的那一溜。房子又高又大,“前出廊子后出厦”,共七间,还带有暖阁,外加一间坐东朝西的厨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家里有枝型吊灯和地毯、沙发。用阿Q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先前阔多了”。

爷爷、奶奶当时还在世,我每天骑着一辆儿童车绕着院里的一棵石榴树没命地转,奶奶就会说:“小林子,不要老是这样,小心跌倒。”我肯定不会听她的话,她晚上就会告状。妈妈总是要呵斥上几句,但并不打我。偶尔挨打,是因为我用水枪将院里晾晒的衣服通通喷湿。



花园胡同11号共住了三户人家：阎太太家住中间；坐北朝南的那一溜房是谭副检察长的家，房产原来是国民党一个师长在撤出大陆前买下来的；我家的房子是坐南朝北的那一溜。房子又高又大，“前出廊子后出厦”，共七间，还带有暖阁，外加一间坐东朝西的厨房。





我每天骑着一辆儿童车绕着院里的一棵石榴树没命地转,奶奶就会说:“小林子,不要老是这样,小心跌倒。”

府前街幼儿园就在长安街上,紧靠着中南海。从花园胡同到幼儿园,我都有包车接送。包车就是三轮车的包月。我由车夫慢慢认识了他的家里人,他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我很能和她玩到一起。她教我“扣饽饽”,我教她“拍洋画”。她家里很穷,妈妈一般不让我到她家去,所以多数时间都是她到我们家来玩。但到家后,她只肯和我在院里玩捉迷藏,她说她爸爸妈妈告诉她,我们家是“有钱有势”的人家,万一丢了东西,就是把她卖了也赔不起。她家我也去过几次,印象中除了房子低矮以外,就是有一

一股气味很不好闻。有一次她病了,我冒着大雨跑到她家。她浑身滚烫,好不容易才从床下的破纸箱里拿出一个五彩的玻璃球,她说这是她妈妈收破烂时捡到的,送给我当纪念,还说以后不能和我一起玩“过家家”了。她妈妈从雨中进来,看到我,就让我赶快走,说她得的是“大脑炎”。我回家以后,被父母说了一顿。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过了不久,我们家也就搬走了,搬到了司法部街“两高”大院。那颗里面盛开着菊花的玻璃球被我保存了很长时间。北京夏季的雷阵雨也被我深深地记住了:疾驰的雨水转瞬间将胡同里的泥沙冲洗干净,雨过天晴,一碧如洗的蓝天,映在我家门口的水洼中,我常常和那个小姑娘在水洼中玩折纸船。

所谓“两高”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那时

高检、高法在同一个大院、同一座办公楼上办公。隔着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还有一个大院是司法部。

大院里的大西楼是个M形的建筑，只是中间那一道跑到屁股后面去了。我家就住在这楼里，楼高两层，我们家楼上有一间，楼下有两间。大西楼据说是日本人建的，有礼堂，可以揣测，当时只是用于办公，而非住宿。楼道里很黑，有那么几盏灯，但仍是什么也看不清。从礼堂开始算，东半段住的是高法的干部，西半段住的是高检的干部，但也仅限于厅处级。如果是普通工作人员和科级干部，只能住平房或小西楼。楼里的干部职务高一点、低一点，只是多一间、少一间的问题，其余没有什么不同。家具都是公家的，人口多的，多一张床，人口少的，少一张床，除了生活必需品，没有多余的摆设，家家都在楼道里做饭。干部刚进城不久，“山药蛋”的习气还保持着，年轻一些的干脆吃食堂。像我家这样雇保姆，顿顿吃炒菜的不多。这可能和母亲的家世有点关系，不过作为孩子，吃什么都一样。我在大院里玩了一天，饿了，就伸出小黑手跟阿姨要馒头吃，老阿姨把我的小手擦一擦，给我二两机关食堂的粮票，我自己就会到食堂里买个馒头。我们几个孩子已经和父母分开住，和我们同住的还有老阿姨（狄阿姨的前任），她原来在一家国民党官僚家里当保姆，会烧一手淮阳菜，妈妈挺喜欢。楼上一间空着，有一张沙发床和一个雕花硬木的大衣柜。大衣柜里有两支长枪和一支短枪。父母都是部队转业的，有枪在当时也不算稀奇。长的是卡宾枪，小口径步枪，短的是左轮，都是美



她说她爸妈告诉她，我们家是“有钱有势”的人家。